

为有牺牲多壮志

——韩道良在梨树

单志

韩道良，海南岛人。生年不详，早年参加革命，后入延安抗大学习。
1945年“八一五”光复后，一支身着灰军装的部队，开到孤家子一带打击国民党反动势力和土匪。这支部队和以前来过的国民党部队完全不同，他们一放下背包，就帮老百姓挑水、劈柴、扫院子，同老百姓亲如一家人。部队首长和士兵告诉老百姓说：“我们是共产党的部队，是人民的队伍”。部队开走那天，留在孤家子几个人，他们在孤家子建立区工委、区民政府。

一、开辟梨树七区

1946年农历正月十六大清早，给原钱家屯老钱家扛活的王振荣，正拿着扫帚给东家扫场院。一抬头，看见从孤家子那边来了四个骑着马穿着军装的人，这四个人到他跟前相继下马。一位戴着灰色朱德帽、个子不高、长瓜脸，穿一双三皮脸的靰鞋，打着绑腿的二十多岁青年人向他走来，身后的人也跟着他走过来，另两个人各牵着两匹马。

走在前面的就是留在孤家子的中共梨树县委委员、七区工委书记韩道良，跟后的是七区区区长蔡振东，另两位是他们的警卫员。

韩道良走到跟前，指着院子，操着江浙口音问王振荣：“这院是你的家吗？”

“不，这是我的东家。”王振荣回答。韩道良一听东家二字，就知道他是给人家干活的。又问：“那你家呢？”“我暂时住东家的一间东下屋。”王振荣指了指院子东侧。

“你是打短工、扛长活？”
“扛长活。”王振荣回答。
“你挣的粮食归我吗？”韩道良接着问。
“两口子还能度命，等有了孩子就不好说了。”

几句对话，韩道良了解了王振荣的身世。他跨前一步，紧紧握住王振荣的手说：“老乡，我们是共产党，是领导人民翻身闹革命的，共产党和穷苦人是一家。”

蔡区长也接了话。他是辽宁口音，说话好懂。他向王振荣讲了共产党的主张和宗旨。王振荣第一次受到这么明确、这么深刻的教育，脸上和嘴角露出希望和笑容。韩道良让他帮着搞宣传，找来穷哥们开个会。

王振荣找来给老钱家扛活的几个人，有任发、任有生、王奎、张坤等。大家在老钱家的场院房里，召开了开天辟地第一次贫雇农代表会。会议由蔡区长主持，韩道良讲话。会上选举王振荣为大草房屯主任。

第二天，韩道良和蔡振东又来到后钱家，与屯主任王振荣一起，到大草房所属的各自然屯，先后召开贫雇农代表会，宣传和讲解斗地主、分田地、闹翻身、求解放的革命道理。会后，韩道良、蔡振东和发动起来的贫雇农及骨干分子，深入贫苦农民家庭，促膝谈心，宣传党的主张和政策，发动群众写标语、刷墙字、大造革命舆论。

梨树县是解放新区，韩道良带领区工委、区民主政府干部广泛开展思想和政治教育，同时培养骨干，壮大队伍，很快组建起礼文、礼教、礼让等村级政权，并成立清算委员会，斗争恶霸地主，开展减租减息，清算敌伪资财。先后清算了日伪开拓团的资产，没收了大地主王化忠、刘才的财产，收缴刘才、徐贡珍等地主的枪支、弹药，在县武装大队的协助下，壮大和武装了区武工队。

区、村政权和地方武装力量成立后，党、政、军组织基本齐备，韩道良和蔡振东在大草房以贫雇农为首，组织全体农民开展划阶级、定成分、平分土地试点，并把总结出来的经验推广全区。各村丈量土地，计算人口，把写有姓名的木牌子钉在地主的地头上。“耕者有其田。”在梨树大地上，在韩道良和蔡振东的领导下，对几千年来的封建土地制度展开首次宣战。

二、为死难烈士复仇

孤家子地处梨树北部，老百姓俗称“北荒”，人烟稀少，匪患丛生。大小匪徒狼集或单独行抢经常发生。被斗被分的恶霸、地主与土匪相互勾结，杀害区、村、屯干部。特别辽河以北的“嫩江队”，也叫“红眼队”，是几百人的反动地主武装，专门从事报复行凶，对党、政、军人员和贫雇农骨干恨之人骨，企图推翻刚刚建立起来的人民民主政权。韩道良一方面派人严密注视嫩江队的动向并发动群众，推动土地革命深入进行；另一方面，带领区中队出击小股土匪，每当有匪情，乘夜出击。韩道良打仗勇敢，常常掂舌土匪，并教育一些土匪迷途知返，或回家生产，或留在区中队，壮大地方武装力量。这个时期，韩道良几乎不分昼夜，废寝忘食，有时太饿了，就让老乡给熬粥充饥。

1946年4月，嫩江队从河北越过辽河窜扰七区，孤家子一带匪迹死灰复燃。区工委、区民主政府和区武工队只有几十人，敌众我寡，力量悬殊。为保安全，七区工委、区政府暂迁徐家油坊。孤家子区政府所在村副队长常耀荣和通讯员孙有成去东北河套回来，在赶往徐家油坊的途中，走到树岗子北。马家窑一个叫张贵的富农，通过土匪刘忠勾引匪首“快轮”，“快轮”骑着张贵家的一匹沙力马，从后边追上，开枪将常耀荣打死，掳去手枪一支。

韩道良得知常耀荣牺牲消息后，决心为遇难烈士报仇雪恨，并决定将区工委、区民主政府迁回孤家子。对迁返有人表示不同意，说这样做危险，整不好大家都得送命。韩道良很生气，他把手枪啪的一声拍在桌子上说：“为阶级弟兄报仇就不能怕死！怕死的回家抱孩子，你们不去我去！”大家见这位平时对

同志和和气气的韩书记，发了这么大的火，大家都同意了。韩道良、蔡振东带上马，直奔马家窑跑去。

马家窑很平静，似乎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。吃过晚饭的张贵来到院子里，嘴里嘀咕：“这帮穷小子，看你还欢不欢实了”。抬头一看，顿觉惊恐，南边的村道上卷起一股尘土，几个骑着马穿着军装的人来到门前。

韩道良一眼就看见拴在院子里的沙力马。他问张贵：“这马是谁的？”

张贵知道事情败露，两腿发软，不敢承认。同常耀荣一起去河套的孙有成指证说：“快轮骑的就是这四匹马。”

韩道良指着张贵，对区中队战士说：“把他捆起来！”

这时，屯里的一些人围上来，张贵的二儿子张景永、老儿子张老丑也跑出来。张老丑上来就问：“你们凭什么绑我父亲？”

有人指着张老丑对蔡区长说：“昨天常村长从这路过，就是他给‘快轮’报的信，也是他牵出马给刘忠，刘忠骑马撵上‘快轮’，‘快轮’骑马撵上常村长的。”

张老丑还在抵赖，蔡振东把他揪过来，摔倒在地上，用枪指着他问：“刘忠在哪？快轮呢？”

“早跑了，早跑了。”张老丑一边回答，一边闪向蔡振东。蔡区长一枪把他击毙。

韩道良和蔡振东连夜将张贵等人带到孤家子，经过审讯，杀害副村长常耀荣的阴谋真相大白。

第二天，在孤家子区政府院内，举行常耀荣追悼大会。韩道良挥泪致辞。追悼大会结束，将杀害常耀荣的主谋张贵押到西河滩执行枪决。这场斗争，严厉打击了土匪和反动地富的嚣张气焰，主犯“快轮”和刘忠被捕杀，判处死刑。（上）

抗战胜利后双辽根据地的建设和作用

王福山

三、双辽全境解放后根据地的巩固、发展以及对东北全境解放的贡献

在1946年6月以后国民党军队占领主要城市和重要城镇期间，以双辽为前沿的西满农村根据地不但没有被消灭，而且进一步发展壮大，人民军队在实力全面增强的同时得到了充分休整。到1947年上半年东北民主联军在西满地区实施战略反攻的时机已经成熟。从1947年3月开始了全线战略大反攻。

在这次大反攻中，在双辽境内打了3次较大的战役。第一次，解放茂林的战役。西满军区辽吉前线主力部队在保安二旅五团团长何光指挥下，向驻守保康、茂林的蒋60军184师551团发起了猛烈的攻击。3月15日夜，这次战斗共击毙敌人百余人，俘获国民党官兵618名，敌警察112人。缴获大量重机枪、六0炮等重武器。在这次战斗中，何光团长在率领部队冲锋时中弹牺牲。第二次，攻打双山县城。5月15日晨，我民主联军黄河部队，仅用三个小时时间就解放了双山县城。敌71军87师259团1营，包括4个步兵连、1个机枪连、1个搜索排、1个炮兵排共计400余人，除10人漏网外全部被歼灭或俘虏。在这场战斗中我军营长邹日贵牺牲。第三次，解放郑家屯。5月24日晚，民主联军骑兵12师2团包围郑家屯车站。困守在郑家屯城里的敌71军87师260团两个营，弃城南逃。我军乘胜追击，将敌军全部歼灭。郑家屯当日收复。从此，双辽全境解放，永远回到人民手中。当时在整个东北战场“农村包围城市”的态势完全形成。我党“最后夺取城市”，解放东北全境为期不远了。

1946年6月，中共西满分局经请示东北局后决定将设在洮南的吉林省并入辽西省，合称为辽吉省。1947年年末，中共辽吉省委和省政府迁驻双辽县。1948年7月6日东北局决定，将辽吉省委改称为辽北省，将原辽宁省领导的部分地区划入辽北省。省委书记由陶铸担任；副书记由省委书记王福山担任。省政府主席由阎宝航担任；副主席由朱其文担任；省临时参议会会议长由于文清担任。省政府下设民政厅、财政厅、卫生厅、教育厅、贸易管理局、粮食局、邮电管理局等行政机构。1947年9月中旬，为了就近组织对解放沈阳、长春、锦州前线作战的后勤支援，加强对根据地土改工作的领导，在双辽县郑家屯成立中共辽吉省委前方工作委员会（简称前委），前委书记由郭峰兼任，在仰天医院（现位于财政新区院内）办公。1948年11月7日，中共辽北省委、省政府、省前委由郑家屯迁往四平市。至此郑家屯作为省级领导机关所在地的历史结束。

在这期间，双辽在继续巩固发展根据地的建设方面主要做了五项工作：

（一）建立民主政权

双辽全境解放当时，辽吉省委立即决定辽源县和双山县合并，名称取两县原名称字头为双辽县，辽源市不再提及。陈凤池、薛广军、高原先后担任中共双辽县委书记，高原任组织部部长、陶泊任宣传部长。县民政府由陈凤池兼县长，不久艾汶接任县长。成立了双辽县武装支队，关振声任支队长，陈凤池兼任政委，刘增瑞任副政委。县民政府下设公安局、战勤科、税务科、财粮科、工商科、农业科、民政科和文教科等机构。

全县组建12个区，建立了党组织，成立了民主政府。城关区区委书记苏民、区长徐步云；张家区区委书记韩兴普、区长孟宗汉；雁翎区区委书记兼区长陆喜明；高金区区委书记张达三、区长谢炳春；卧虎区区委书记兼区长张光斗；茂林区区委书记杨子义、区长黎明辉；服先区区委书记记兼区长宁仲逸；孔家区区委书记记马喜山、区长顾占生；安边区区委书记赵洪波、区长张豁然；敖卜区区委书记齐涛、区长丁万昌；双山区区委书记兼区长张儒；新立区区委书记记边展、区长梁洪喜。全县所辖的137个村，也在较短时间内都建立了农会组织和民主自治组织。当时称村级民主政权为“村公所”。

（八）

第二编

四平党组织在抗日战争时期

（1931年9月—1945年8月）

党史

鸦片交易不仅在中国进行，还运往法西斯国家。1941年，为了清偿对德国的700万马克的借款，伪满与法西斯德国签订第三次经济协定时，向德国输出7吨鸦片，每两价格是30元。向日本输出过2吨鸦片，价格也是每两30元。1945年4月，向汪伪政权贩卖10万两，每两价格则是50元。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中指出：“日本从事麻药交易的真正目的，不仅是要腐化中国人民，并且有比这更危险的性质”，即“把满洲所栽培的以及朝鲜与其他地方输入的鸦片，在满洲精制后，再运往世界各地。”

七、文化奴役的加深

日本侵略者的罪恶目的是要把东北永远变成日本的殖民地，为此，伪满不仅在政治、军事、经济领域加强控制和榨取，而且在思想文化领域建立起对东北人民的专制统治，强制施行奴化教育。

1932年，伪满政权建立之初，就设立了资政局弘报处，专门负责全满思想文化管制工作。不久撤销资政局，在伪国务院总务厅内设立情报处，统管伪满的新闻出版广播等舆论宣传工具。1937年又改称弘报处，其职能不断加强，进一步把电影、文学、音乐、戏剧等文化事业控制在手中。以出版界为例，1932年10月出台的《出版法》明确规定：凡是危及伪满洲国存在，“惑乱民心”的书籍，一律禁止出版，对具有民族意识和反满抗日内容的读物严加取缔，对宣传共产主义的书刊更是严加查处，一旦发现则统统烧毁。1932年3月到7月，仅5个月的时间，敌伪就焚书650余万册。伪满洲国一出笼，就严令东北各地不得悬挂中国地图，不得使用“中华”字样，不得使用中国教材，禁绝和限制一切具有民族意识的文化传播。相反，日伪当局则大量输入日本的殖民主义文化，日本的书籍、报刊、电影等充斥了整个东北文化领域，极力宣扬“日满一体”“天皇至上”“王道乐土”等殖民主义毒素。仅1939年1年内，日本发行到东北的报纸就达5494余万份，杂志827余万份，书籍1440余万册。东北人民陷入了文化专制的黑暗深渊。

与此同时，则大肆推行奴化教育，妄图使东北人民忘掉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，充当日本的顺民。其主要手段有强制人

们学日语、篡改历史、移植宗教等。

1937年伪满颁布“新学制”。关于“新学制”的任务，伪民生部的训令明确指出：“为养成忠良国民，即以建国精神为基础，陶冶人格，涵养德性”。也就是要中国人俯首贴耳地充当日本殖民者任意驱使的奴才。“新学制”的这种文化奴役性表现在许多方面，其中很重要的一点，就是明确规定日语即“国语”，意在强调日语不是外语，而是“满洲国”的“国语”，使日语教学在整个课程体系中占据了突出的地位。从小学开始就强迫学生学日语，而且日语课时越来越多，到后来竟然超过中国语文课时一倍以上。为了鼓励师生学习日语，日本当局实行了语学津贴制度，每年考核一次，成绩优异者可以升级，日语分为特等和一、二、三等，评为特等的每月发给10元津贴，每等差2元。那些学不好日语的学生则升学、就业都很困难。当时，伪满各机关中的主要负责人都是日本人，来往公文、函件也多用日语，中国职员看不懂日语，就很难应付工作，为了保住饭碗，他们也不得不学习日语。

日本侵略者还肆意篡改历史，颠倒黑白，歪曲真相。把侵略中国的甲午战争说成是日本人对中国人的鹰惩，是由于中国人不守信义而引起的。日俄战争则是日本人的仗义行为，是为了“挽救满洲人”的痛苦才打的。更为荒唐可笑的是，把日本侵略中国的九一八事变说成是东北人民仇恨张家父子的残暴，群起反抗，由于东北人民的恳切邀请，日本皇军不肯坐视东北人民遭受痛苦，才仗义兴师，帮助东北人民获得独立。伪满洲国的建立，全赖友邦之仗义尽力。因此要对日本的“援助”表示感谢和报恩；友邦又率先承认伪满洲国，而伪满皇帝又躬访日本，宣召训民，以日满一德一心，两国人民，益形亲密，于斯日满两国，遂成永久不可分离之关系；更要做皇帝的顺民。从而继续向学生灌输“日满亲善”“一德一心”“同文同种”“民族协和”“共存共荣”“王道乐土”等反动思想。

（未完待续）



挤香油和斗拐

朱乃波

没有人能留住岁月的脚步，但我们可以留住美好的记忆，没有人可以永远年轻，但我们可以保持一颗童心。

20世纪60年代末，我在小学读书。那时的教室都是单层窗户，秋天时糊窗户缝的纸条被风刮破了。风一刮，冷风从外面吹进来，发出呜呜的响声，屋里用砖砌的炉子也不是很热乎，坐在教室里感到很冷。

下课的铃声响起，同学们跑出了教室，就玩起了斗拐的游戏。

有时候分伙，每伙5到10个人，分成两排站好。中间隔一段距离，然后孩子们用一只手扳住左脚或右脚的后脖子，膝盖弯曲，好似一个尖尖的鸡头，形成金鸡独立，单脚踮着往前冲，然后用膝盖和前面的对手相顶撞。有的抬起的脚被撞得站立不稳被迫落地，有的不慎倒地。拍拍身上的灰土，站起来继续搏斗。一时间，孩子们的吵闹声，欢笑声，此起彼伏。

斗拐是一种一对一的体能游戏，融体能、智慧、技艺和观赏性为一体。有时也不分伙，散斗。个高身体强壮者占优势。那时我们班有一个男同学，身高体壮，大家给他起个外号“小牦子”，往往会一个人挑战两三个人，众人围着攻击，都不能取胜。于是就用车轮战的方法，轮番上阵，直到把他累得气喘吁吁，自动退出。这一项游戏适合在冬天玩，因为穿着棉衣棉裤，剧烈的顶撞或摔倒也会减少疼痛，同时玩这个游戏，也可以取暖。上课铃声一响，浑身热乎乎的跑进了教室。

北国的初春乍暖还寒，下课了，太阳高高的挂在天上，暖暖的阳光照在身上。同学们靠在教室的南墙边晒太阳，于是

就开始了‘挤香油’游戏。这面墙就成了战场。

同学们个个穿着朴素，站成一排。班长在队伍里大喊了一声：“预备，开始！”于是大家弓着腰，斜着肩膀，蹬着腿，攒足了劲儿往中间挤。左边的同学使劲往右边挤，右边的同学用力往左边挤，嘴里还喊着：“挤、挤、挤香油，挤出香油换糖球！”

在众人的推挤下，有的人帽子被挤掉了，有的衣服扣被挤掉了，还有人被踩掉了鞋。大家欢呼着，叫嚷着。有个孩子从右侧紧贴“小牦子”，然后想法把右手伸到他的背后，用力往外撬，使他身体离开了墙，两边一挤就把“小牦子”挤出了队伍。于是大家一起喊：“好！好！”“小牦子”面红耳赤，只好又排到队伍后面，用力往前挤。

在队伍忽左忽右，来回拉锯式的对抗中，大家的身子便暖和起来，小脸红扑扑的，都浸出了汗珠。身心都是暖的。直到上课铃声响起，大家才兴冲冲地回到教室。每到课间，同学们都喜欢玩这个游戏，乐此不疲！

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岁月的消逝，童年天真无邪的往事有些已尘封在记忆里，但那无忧无虑快乐游戏的情景，至今仍历历在目，仿佛就发生在昨天！